让新思想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读《“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思想》有感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陈华文

如何将思想理论进行多维度的生动呈现，这是近年来理论工作者格外关注的问题。而在理论传播中，新时代无疑是一个热点高频词，只有对新时代的内涵有清晰的了解，当前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有更深层次的认知。认识我们的新时代、把握新时代脉搏，读通俗理论读本《“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思想》一书，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全书共12章，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起点，对新时代在新思想指导下的新实践进行概览式回顾，集中运用图片、漫画、数据、故事四种表现形式，以“四说”展现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新思想的内涵价值。作者着重选取贴近人们生活感知、具有代表性的新颖素材和热点话题，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反映新时代不同侧面的面貌，设置“新思想打卡”板块，使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相结合，鲜活简明勾勒新思想的内涵要义，激发人们对国家和时代的热爱自豪之情，产生对新思想的学习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一脉相承，又体现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有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思想》一书中，以《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开篇。在该章中，则以“数说新时代、新气象”“图说社会主要矛盾”“事说这个舞台属于谁”“新思想打卡”这些部分组成。该章指出，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成就令人赞叹：在“中国一分钟”里，中国是这样的：一分钟减少34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2020年二氧化碳减少排放17.9亿吨；一分钟新建高铁4.8米，2020年高铁投产2521公里……这样的数据列举下去，还有很多很多，总之一句话：新时代彰显出磅礴力量和发展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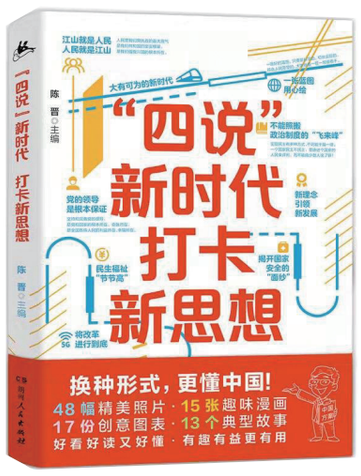
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站上新的起点，持续实现新的跃升。“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本书第五章《新理念引领新发展》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1952年我国GDP仅为679亿元，人均GDP为119元，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落后穷国。而在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剧烈波动，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依然跃上新台阶，国内GDP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我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新格局彰显新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总体上讲，《“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思想》一书，章节体例新颖、内容结构完整，文字表达生动、文图设计精巧，是众多通俗理论读本的上乘之作。

（《“四说”新时代　打卡新思想》陈晋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一支史笔写春秋

——读《抗倭名将俞大猷》

彭晓玲

我很早就读过曾纪鑫的《千秋家国梦》，并为其广阔的视野、对历史及人物深刻的剖析与生动的叙述折服。去年夏天，在大连的一次笔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曾纪鑫。回家后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书。

在我看来，《抗倭名将俞大猷》堪称传记作品中的典范，既为作者曾纪鑫创作技艺所折服，更为抗倭名将俞大猷的精神气节所感动。

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

此书中所录史事典故，皆探求源典，孤证不取，秉承了作者一贯诚挚的书写态度。

作者曾经通过多种途径尽可能地搜求俞大猷的相关资料，通读一遍后，对重点内容进行认真研读。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实地探访了俞大猷的家乡泉州，寻访了与俞大猷相关的濠溪桥、俞大猷墓地等。

当俞氏宗亲顾问、泉州市俞大猷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继川老师读到曾纪鑫创作的《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时，被他的文字深深打动了，邀请他参加纪念俞大猷诞辰510周年学术论坛。随后，俞氏宗亲协会又约请他创作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俞大猷传》。

《俞大猷传》本不在曾纪鑫的创作计划之列，但他被俞氏宗亲协会常务副会长俞侨福先生、著名编剧康天赐老师等人的真诚所感动，也被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境界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思虑再三，还是答应下来了。

随后，作者又埋头做“功课”，读了不少与俞大猷及抗倭相关的书籍、研究资料，特别是俞大猷的《正气堂集》。《正气堂集》90多万字，全是文言文，作者硬是一读再读，尽可能地进入俞大猷当时的环境氛围之中，由此把握了俞大猷的一生历程。

客观平实的史家笔墨

全书共有16章，作者以“还原历史，回归真相”的写作态度，基本完整地还原了俞大猷一生的戎马踪迹，展现了俞大猷作为一代名将心怀国家、刚毅沉着、宠辱不惊、不惧生死、教化于民的精神风貌。

纵观全书，作者始终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未被某种情绪、某一观点所左右。正如作者所言：“一如俞大猷之为人，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地按其人生阅历、时间顺序来写，并没玩什么技巧与‘花样’。”

在书写过程中，作者发现，出于各种原因，重要的抗倭史料对俞大猷的事迹要么不记，要么少记，个别地方甚至有所歪曲。如《筹海图编》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对胡宗宪的功绩多有夸饰，而对受过胡宗宪诬陷的俞大猷，笔墨十分吝啬。这对俞大猷太不公平了。

为此，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沿袭前人的评价，而是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公正而客观地将俞大猷的历史功勋一一展现出来，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俞大猷。

质朴通俗的叙述语言

如果说“雅”在于视角的宏阔和思想的深邃，“俗”便在于其通俗的文学语言和戏剧化叙事方式带给人们强烈的阅读欲望。那么，在《抗倭名将俞大猷》里，“雅”与“俗”得以完美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方面，作者视野开阔，站位很高，对整个明朝倭寇产生缘由、发展历程及特征剖析深刻，对明朝面临的形势分析到位，为再现俞大猷这位民族英雄的人生境界与人格魅力营造了宏阔的背景。再者，作者写历史人物，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叙述这些显赫的个体，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方方面面的描述与反思，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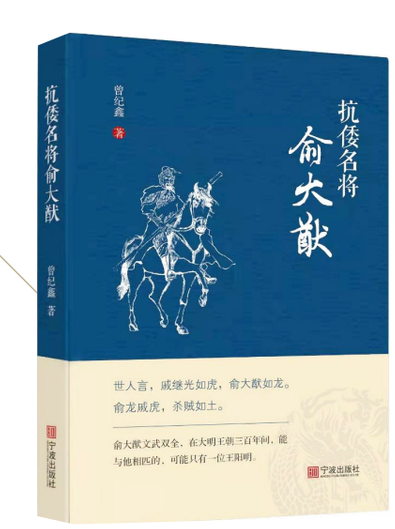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了历史事件的戏剧性特点展开叙事，行文朴实流畅，叙述俞大猷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

与此同时，作者还依据事件发展的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对特定情境中的人物进行心理刻画和气氛渲染，将那些从史料中走出来的俞大猷、胡宗宪、徐海、汪直、吴平等人刻画得丰满鲜活、真实可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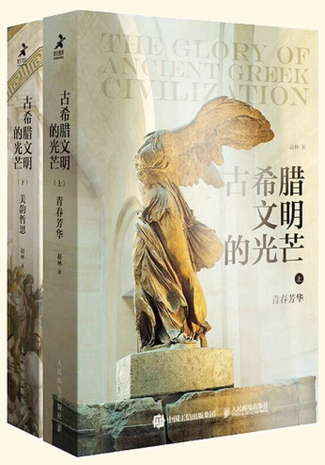
在叙写过程中，其语言在整体架构上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平实但不平淡，透出拙朴的典雅。也因此，作者巧妙地将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融入清新稳健的语言之中，使得全书具有一种质朴晓畅的行文格调，读来如沐清风。

可以说，为了写好《抗倭名将俞大猷》，作者下了大功夫，展现其一贯严谨治史的精神。

（《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纪鑫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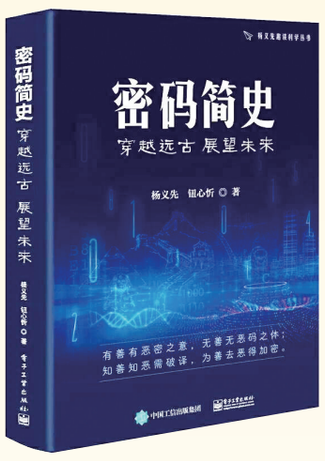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古希腊文明的光芒》
赵林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本书作者数十次踏上古希腊遗址，积四十年研习之功，重回两千多年前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从神话、城邦、宗教、艺术、戏剧、哲学等几个方面，描绘希腊文化从发源、兴起、繁荣直至落幕的宏阔历史长卷，并阐释希腊文化的后世影响。全书既有历史的细腻，也有哲学的宏大；既有充沛的情感，又有深刻的沉思。



《密码简史：穿越远古　展望未来》
杨义先　钮心忻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由信息安全领域的专家杨义先、钮心忻教授撰写的这本科普读物，将为我们揭开密码的神秘面纱，追溯密码的起源，介绍从古至今的各种密码及相关的重要人物与故事，展望量子密码、DNA计算机等未来密码。全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来介绍相关专业知识，使加密、解密的过程看起来像玩游戏一样有趣，兼顾了知识上的专业性和阅读上的趣味性。

书香闲情

做只资深书虫，也是一种愉悦人生

马珂

无论出差还是休假，临行前往行囊中塞入几本书，是我多年以来的习惯。曾有人送我一个“书虫”的绰号，欣喜中藏着些许得意。

对阅读产生兴趣，最初源于小人书的诱惑。童年时代家住沅陵山区的我，有年夏天被父亲领进县城。在陈旧低矮的新华书店右侧，一处围坐着一大群小孩的小人书摊吸引了我的目光。征得父亲的同意，我也开心地加入其中。那以后，我喜欢上了阅读。只要父母或爷爷进城，总盼着他们带几本小人书回家，一旦拿到就爱不释手。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上初中以后。有回找同学借到一本没有封面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利用课余时间读了起来，很快就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看完后还久久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命运之中，在对女主人公林道静的革命精神深感敬佩的同时，也对她嫁给出生地主家庭的余永泽这一草率行为感到不平和惋惜。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成了我人生中阅读的第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高中时正遇上文学空前繁荣的上世纪80年代。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名作。有年夏天格外炎热，在没有降温设施的情况下，只好端来一脸盆冷水，将两条毛巾浸湿拧干后分别展开搭在光膀子上降温。待毛巾变热后再浸湿，再拧干，再搭上，一直阅读到深夜。发奋读书使我在获得学校和怀化地区“读书积极分子”称号的同时，文学作品也开始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登载。

人生中的阅读高峰是在大学期间。每逢周六周日，都要去当地最大的图书馆读书。出发前将两只大馒头塞进一个特大号的搪瓷杯里盖上杯盖，配上调羹一并装进帆布挎包，然后在学校门外的公交车站乘上汽车，中途转一次车，就到了图书大厦。进入宽大的阅览室选一处位置坐定，边读边记的模式就此开启。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大学第一学期，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欣然带回学校利用课余时间认认真真地阅读起来，并详细做了一整本的阅读笔记。没料到第二学期就有了这门课程。

多年的阅读经历，让我获得了乐趣和丰富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塑造了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缓解压力的方法。可谓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以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人生的枷锁》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毛姆算得上骨灰级大书虫。他一生嗜书如命，曾写下一部脍炙人口的读书随笔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我的一次人生经历，还的确印证了这部名著所阐述的真理。初次赶海那回，大海退潮时露出大片大片的淤泥海滩，无数身材娇小的滩涂鱼在夕阳下左蹦右跳，构成一幅壮丽的图画。兴奋的我卷起裤腿就往淤泥深处走去，不料双腿越陷越深，无力自拔。危急时刻，我想起一本书上所写的自救办法，俯身卧倒在淤泥之上减小压强，然后用双手慢慢爬了出来，避免了一次人生灾难。

中华民族是拥有数千年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有关读书的事例无以计数。仅在成语中就有“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牛角挂书”等，分别记录了古代贫苦青少年匡衡、孙敬、苏秦、车胤、孙康、李密刻苦读书的励志故事。

我省作为湖湘文化的发祥地，2009年起，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推出了“三湘读书月”活动，并于2015年更名为“书香湖南”全民阅读活动，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尤其是2019年，由湖南图书馆自主研发的阅读平台上线后，目前已有近千家图书馆注册使用。读者只需在手机上轻触屏幕就能无线互联，让爱书者享受到数字阅读带来的方便与快捷。去年，我省又推出10个全民阅读活动先进典型，进一步为我省建设书香社会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书香四溢的氛围中，做只资深书虫，也是一种愉悦人生。

好书摘读

郭嵩焘的性情

孟泽

让当时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奏劾所上的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说“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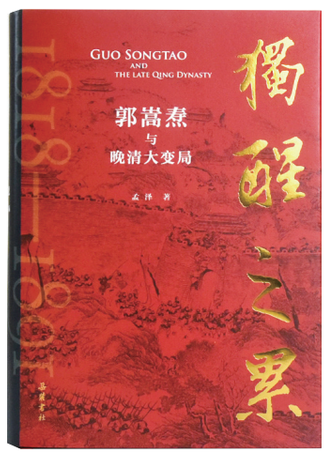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做得像左宗棠那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那样集“功、德、言”于一身，做得像李鸿章那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似是而非。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其实，郭嵩焘对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以至于“一事乖方，椎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范围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中，也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

（摘选自《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　著　岳麓书社出版）